論　著

此生已注定？從社會網絡再探關露（1907-1982）的顛躓人生 *

張　皓 **、江品萱 ***、李柔漪 ****

摘　要

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政府基於國族主義立場推動大規模漢奸審判，在十數年間，受審案件多元且牽連人數甚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第十四屆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國際研討會」(2023 年 12 月 3 日)。全文寫作過程承蒙連玲玲老師及葉韋君老師的提點及協助，在此致上萬分謝忱；再者，也感謝李宗信老師於研討會報告後不吝給予我們支持及鼓勵。而在審查期間更有幸獲得兩位細心、專業的匿名審查人所提供之寶貴意見及修改建議，在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24 年 9 月 25 日，通過刊登日期：2025 年 2 月 17 日。
**　張皓，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通訊作者）
***　江品萱，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
****李柔漪，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廣，關露案即為其中具高度代表性的案例。然而基於研究方法限制，除了傳統文本分析之外，過去對於關露的研究成果，往往難以整體性掌握歷史行動者的社會互動關係樣貌。

因此，本文嘗試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針對行動者社會關係進行考察，以探究諸如社會連帶效應等可能影響人生歷程走向的結構性因素——除了潘漢年案牽連之外，關露是否也會因其他社會互動關係衝突，而可能遭受更多元形式的鬥爭？

本文的數據資料主要來源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建置之「近代婦女期刊資料庫」及「近代婦女傳記資料庫」，其中包含黨政組織、婦女刊物作者及抗日時期婦運團體等人員名單。且除了綜覽關露的整體社會互動圖像，也以早年曾與她互動密切、同為左聯成員的女作家丁玲為例，比較分析兩人可能面臨的思想批鬥、性別輿論等團體分化情形。最後，經由社會網絡分析與文本史料的交互辯證，我們既發現 1939 年以後與上海抗日婦女運動社會網絡的極度斷聯，可能使關露在面對漢奸指控時落入更加被動處境，也注意到過往研究較少提及的文革周揚案，實為致使關露遭遇更嚴苛批鬥的關鍵原因之一。

關鍵詞：文化大革命、性別、社會網絡、漢奸審判、關露

前言

> 關露身在敵營，處境險惡，親友和社會不明真相的人，將她誤認為民族敗類，一時聲名狼藉……關露蒙冤長達二十多年，致使晚境孤獨淒涼……為了中國的抗日戰爭勝利，置個人生死於度外，在最危險的地方收集情報、暗中支持進步青年，出色地完成了黨組織交辦的各項任務，人民永遠不會忘記為共和國作出特殊貢獻的關露。[1]
>
> ——丁言昭（《關露傳》作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政府基於抗戰時期國族主義立場，對漢奸進行大規模的審判活動。因此，無論是 1949 年以前的國民政府或是中國共產黨政權，均針對他們所認定的「漢奸」施以一定程度清算及懲罰。[2] 至於大陸政權交替後，中共政府也針對地主階級、[3] 右派、[4] 文藝界有不同階段的「清洗」行動。而本文所欲探討的關露案，在這其中更是具有特殊代表性——其戰前作爲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員及中國共產黨員，於抗日時期投入敵後情報工作，戰後則因其地下黨時期直屬長官潘漢年（1906-1977）涉入共產黨鬥爭

1 丁言昭，〈序〉，《關露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 1-2。

2 羅久蓉，〈抗戰勝利後中共懲審漢奸初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3（下）（1994 年 6 月），頁 267-291。

3 高王凌、劉洋，〈土改的極端化〉，《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 111（2009 年 2 月），頁 36-47。

4 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 40（1997 年 4 月），頁 21-34。

而遭受漢奸案連累，接著又於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文藝路線批鬥，長達二十多年無法獲得官方平反。

作爲一名活躍的左翼女性作家，且眞實身分爲共產黨滲入敵後的間諜，如此「忠黨愛國」的關露（1907-1982）爲何最後在戰爭勝利、中共建立政權後，卻似乎「永無寧日」地捲入不同時期的大規模批鬥？事實上，關露案之所以擁有高度爭議性，係因其牽涉女性、間諜（從而遭致「漢奸」指控）、左聯作家以及共產黨員等多重角色衝突處境，使得她不僅難逃漢奸案牽連，更無可避免涉入中國共產黨對文藝集團的大規模批鬥案件當中。

但綜覽關露傳記資料時，仍有許多值得探索的模糊地帶，致使往後研究者較難釐清上述各項批鬥案的眞實細節：例如以關露爲主角的傳記文本，多是出於爲其平冤角度下的詮釋性書寫。傳記作爲一種特定意識形態的史料載體，在多數時候可以反映傳主生存時代的部分文化、社會特徵縮影，以及傳主或傳記作家可能潛藏的自我意識。[5] 但在關露的自傳式小說中，我們實難具體理解事件的社會脈絡，僅能隱約理解關露的個人性格特徵，[6] 且在丁言昭於關露身後爲其撰寫的傳記《諜海才女》當中，雖可較具整體性地掌握關露的生命故事，但針對批鬥案的說明仍是採取企圖爲其平反的史觀視角。[7]

---

5 Barbara Caine, *Biography and History*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9), pp. 2-13.

6 關露，〈黎明（長篇小說）〉，《女聲》（上海），卷 2 期 6（1943），頁 28-31；關露，〈黎明（長篇小說）〉，《女聲》，卷 2 期 11（1944），頁 26-29。

7 丁言昭在關露逝世後，先是於 1980 年代末期將關露傳以《諜海才女》

最後，當前多數的關露研究／評述文章，大多是從三種面向討論其生命史：一是以上海淪陷時期於《女聲》雜誌擔任編輯歷程爲例，研究該時期關露對於《女聲》雜誌的貢獻、撰寫之文章、評論等；[8] 二是書寫關露傳記，從童年伊始，逐步鋪陳其如何擁有左翼思想、爲何痛恨封建制度以及她對於共產黨的貢獻，並試圖爲其往後所遭遇的漢奸指控平反；[9] 三是探討關露作爲文藝間諜的身分特殊性，考察其在二戰時期上海淪陷區透過擔任編輯僞裝間諜活動的行動過程。[10]

而多數臺灣學者對關露的研究則聚焦在文藝活動的討論，並以《女聲》雜誌相關研究爲主。值得注意的是，羅久蓉的〈忠誠楷模：關露的顛躓人生〉試圖從更大的個人生命史視角，剖析關露各個時期的作品論述，並同步檢視關露的生平經歷，以考證其如何在近代中國複雜的社會情境下，試圖去完整保留自己的三種社會角色──女性、黨員、作家──的身分主體性。關露作爲一個有強烈自我意識的女性個體，處在如此高壓的社會夾縫中生存實屬艱辛，研究者試圖還原中國共產黨與關露之間所謂的「忠誠」辯證課題，事

為名出版。在 2009 年的《關露傳》出版後，則於後記提到《諜海才女》因為無法言說的原因，故將關露在七十六號特工、當《女聲》編輯以及赴日參加「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等情節刪除。丁言昭，《關露傳》，頁 197-198。

8 闕慧蓉，〈1940 年代上海地區之女性文學活動──以關露、蘇青、潘柳黛、施濟美、俞昭明為探討中心〉（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15）。

9 丁言昭，《關露傳》；蕭陽、廣群，《一個女作家的遭遇：記關露一生》（黑龍江：北方文藝出版社，1988）。

10 涂曉華，〈上海淪陷時期《女聲》雜誌的歷史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期 3（2005 年 6 月），頁 85-104；梅娘，〈兩個女人和一份婦女雜誌〉，《新文學史料》，期 1（2001 年 3 月），頁 175-179。

實上是透過關露自我犧牲下才得以換取最終名譽恢復的結果。[11]

總而言之，史家對於關露的討論，或多以傳記爲書寫方式，藉由其童年至晚年經歷的考察來惋惜、感嘆關露坎坷的一生，或以《女聲》雜誌爲切入點，討論其作品之文學性或其思想、公共書寫對婦女議題的貢獻，卻甚少論及關露和其參與之各式團體的整體社會互動關係如何，以及其遭遇一系列批鬥案的命運是否又反映了哪些社會結構性問題——假如我們無法釐清行動者生命史當中更大的社會活動脈絡，便難以分析關露所遭遇的一系列苦難背後可能涉及的整體性結構成因。正是由於關露一生接觸團體甚多、社會交往關係甚廣，若能據此理解其周圍團體、行動者的社會角色位置或所涉及的重大歷史活動，就有可能解釋在潘漢年案的鬥爭牽連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社會因果機制（例如：參與公共活動的社會動機、團體角色位置、社會關係的親疏性等）決定了關露往後被批鬥的命運。換言之，若從社會網絡分析視角觀察，成爲批鬥對象或許不單單只是上層牽連的偶然結果，而是有多種社會關係互動路徑的作用，導致個人涉入更高程度的風險環境之中。

因此，我們參考近年運用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方法的婦女史研究成果，例如：葉韋君的〈後五四時期的知識婦女：《婦女共鳴》的社會網絡（1929-1944）〉試圖以考察婦女雜誌編輯們與主要作家的社會網絡變遷的

11 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 65-132。

方式，理解民國時期中國女性知識分子的公共活動樣態。[12]透過分析這些包含作者、編輯成員資訊的「書面文獻」，並以此為依據建構一連串各團體與人物之間社會關係的立體圖像，這樣的研究視角是過往婦女史研究中較少採用的；[13]搭配社會網絡方法分析婦女史，也有助於立體化婦女於社會中的定位、形象與活動，單靠文本論述資料其實較難有效達成此效果。

而觀察關露的傳記與自傳式小說，我們注意到其確實有刻意偏重／模糊的生命故事細節，因此借鑒過往婦女史研究成果，使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的優勢在於運用這些能間接串起社會互動關係的「隱匿文本」，或許得以找到一些傳記作者在書面上不願書寫，又或者是敘述內容過度破碎、發散的故事線索。職此，本文欲以關露於民國時期（1928-1949）至遭受二度批鬥（1966）之前的社會網絡關係為研究主軸，透過其社交足跡、團體互動的歷史紀錄，再探關露的顛躓人生。

在進入正式分析之前，首先須於方法論層次闡明社會網絡分析的操作重點及適用研究主題。社會網絡是一種藉助節點（node）與線（edge）交織形成的網絡，並根據網絡的類型及其中行動者所處的結構位置，判斷特定社會互動現象是否存在以及其目前發展階段為何。研究者將個別行動者、團體視作相異的節點，其彼此的互動關係則以連線表示。再

12 葉韋君，〈後五四時期的知識婦女：《婦女共鳴》的社會網絡（1929-1944）〉，《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3（2019 年 6 月），頁 113-162。

13 衣若蘭指出近年來學界更整合數位人文與社會網絡的研究方法，預期對我們解讀婦女史料有相當的突破。衣若蘭，《從列女傳到婦女史》（臺北：時報文化，2023），頁 16。

者，統計單一節點連接其他節點數、節點之間於特定距離內所共同連接的節點數多寡，或是辨識連線的單向或是雙向屬性，即可考察如行動者／團體影響力、個體之間社會關係親近程度，抑或個體在訊息流通中所處的位置（例如：接收者、傳遞者或雙向交流）等社會互動狀態。[14]

另一方面，不同於其他統計方法，社會網絡分析係以「決定論」立場面對其資料分析結果——判定這些經由測量得出的連線關係、互動強度等網絡狀態爲「眞實情況」的反映。[15] 而當行動者處於不同網絡位置時，將決定其各自所屬的社會結構角色，使其在控制社會互動網絡運作與汲取其中社會資源方面擁有不同能力或限制，且進一步也有可能形塑個體特定的行動偏好。[16] 由此可見，影響個人行爲取向、獲得社會資源多寡的結構性因素，不僅是諸如性別、教育、職業、居住地區等既存社會條件，從關係性分析觀點來看，也有可能是來自其社會關係網絡形態及所處的社會互動結構位置。

另外，研究者所要考察的社會網絡類型，又可根據社會關係當中節點屬性不同，能夠被區分爲一模網絡（one-mode network）與二模網絡（two-mode network）。通常只依單一類型節點構作的連線網絡爲一模網絡，像是單純只依據行動者（人）的社會互動關係觀察政黨成員之間社交網絡（哪些

14 張皓，〈殊異的共同體：臺灣南、北客家菁英的社會網絡（1987-1999）〉，《全球客家研究》，期 17（2021 年 11 月），頁 1-48。

15 Robert A. Hanneman and Mark Riddle, *Introduction to Social Network Methods*. (Riverside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2005), https://faculty.ucr.edu/~hanneman/nettext/（2023 年 11 月檢索）。

16 王占璽，〈社會網絡分析與中國研究：關係網絡的測量與分析〉，《中國大陸研究》，卷 58 期 2（2015 年 6 月），頁 23-59。

人形成更緊密的派系團體、哪些人是橫跨多個社交圈的黨政召集人），或僅以團體為單位觀察各政治運動組織的互動關係網絡（各組織之間參與成員重疊性有多高）；將個人與團體、事件連結，由兩種不同類型節點所構成的社會關係網絡則稱之為二模網絡，用以表現行動者與團體之間的互動關係或團體與事件間的關聯性，像是作家／編輯（行動者）和其參與投稿／編務的刊物（團體）的關係網絡，抑或社運組織／政黨（團體）參加了哪些大規模遊行（事件）的關係網絡。

本文運用的社會網絡數據庫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建置之「近代婦女期刊資料庫」及「近代婦女傳記資料庫」──前者主要蒐集 1904 年至 1952 年共 216 種近現代婦女期刊，類型包含商業、校刊、政黨、民間組織刊物等，並提供研究者進行內容檢索、關鍵詞統計分析及社會網絡檔案下載；後者則係在資料庫基礎上進一步建置作者研究平臺，以提供作者傳記及其社會關係資料，如此便能以期刊作者主體為網絡核心，觀察其個人與外部行動者／團體的社會互動關係。

針對關露相關案例，則主要使用黨政組織、婦女刊物作者及抗日時期婦運團體等人員名單，另外也根據既有傳記文獻提及的其他人物或社會團體關係相關線索，再行增補資料庫網絡內容並建立網絡圖像。至於研究所操作之繪圖分析工具為 Gephi 社會網絡分析程式，主要整理傳主投入政治活動期間的社團參與網絡圖（二模網絡）、傳主與其同一團體行動者各自參與團體／刊物活動的社會網絡圖（二模網絡），以及刊物／團體參與者重疊規模網絡圖（一模網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此一資料庫內容仍以期刊團體成員以及

婦女運動團體網絡爲主，顯而易見的是本文所呈現的網絡圖像更多係以文藝創作群體及較具規模之黨政運動團體的社會關係爲基礎，最大研究限制即在部分規模過小的刊物或團體名單之資料缺失。因此，我們也只能先聚焦觀察關露在 1955 年以前各個文藝、政治團體中的社會網絡位置，並據此與既有文獻資料對話，進行初步因果推論。

一、左翼赤誠的萌芽——關露戰前的政治性社團參與經歷

關露早期接觸左翼思想可以分成三個階段：第一是在進入南京中央大學（以下簡稱中大）之前，因認識李劍華（1900-1993）而初次接觸左翼思想；[17] 第二是由其妹妹胡繡楓（生卒年不詳）引介，認識了共產黨員林楚君（1905-1986），並在討論文學的過程中更加深關露對於左翼思想的認識；第三則是進入中大後經過室友涂瑋（生卒年不詳）介紹其男友鍾潛九（生卒年不詳），其當時正擔任校內「社會問題討論會」的負責人。[18] 此後關露便時常參與討論會，也因此認識往後與鍾潛九共同創立《幼稚周刊》的張天翼（1906-1985）、韓起（生卒年不詳）等人，而關露又透過他們認識了彼時從日本歸來的胡風（1902-1985），[19] 並第

---

[17] 丁言昭，《關露傳》，頁 10。

[18] 蕭陽、廣群，《一個女作家的遭遇：記關露一生》，頁 44-47。

[19] 丁言昭，《關露傳》，頁 13-14；蕭陽、廣群，《一個女作家的遭遇：記關露一生》，頁 62-66。

一次深刻理解「普羅文學」的意義。[20] 而在中大就學期間，關露除了接觸西方哲學、文學外，其所緊密交流的朋友、社團夥伴幾乎多是具備左翼思想的「進步青年」。[21]

由此可知，中大的學思歷程既是關露從事普羅文學創作生涯的起點，也是其逐漸開始組織化投入左翼運動的生命歷程轉捩點。然而中大實爲國民政府具代表性的黨政官辦大學，且關露考入中大的 1928 年正值國民黨大舉推動清黨運動時期，那麼這些左派組織在中大當中究竟是在什麼樣的校園結構縫隙下生成的呢？

雖然從「1929 年中國國民黨南京特別市第八區黨部各區分布一覽表」[22] 可得知，其第一到第六分部全都設址在中大校園內，然而這並不代表國民黨組織力量能有效控制中大。實際狀況與之相反，中大黨部組織不僅與校方缺乏密切聯繫，還時有衝突發生：如 1928 年 10 月第八區黨部曾致函指責中大發行之《日刊》當中，文章內容未盡黨意，更屢有登載「國家主義」立場論文；1929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的黨員大會選舉，更礙於校規使得中大學生黨員無法出席，並造成大會流會兩次。[23]

事實上，中大首任校長張乃燕（1894-1958）長期不認同黨組織干預教育行政，也因此幾乎被黨中央視爲有意壓制校

---

20 蕭陽、廣群，《一個女作家的遭遇：記關露一生》，頁 72-89。

21 丁言昭，《關露傳》，頁 14；蕭陽、廣群，《一個女作家的遭遇：記關露一生》，頁 45。

22 蔣寶麟，〈中央大學的國民黨組織與國共鬥爭（1927-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3（2011 年 9 月），頁 6。

23 蔣寶麟，〈中央大學的國民黨組織與國共鬥爭（1927-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3，頁 6-9。

內國民黨勢力、縱容異黨窩藏的反對派團體協力者。1928 年 7 月，國民黨江蘇省黨務指導委員會即函請大學院與江蘇省政府，令飭中大校長盡速「徹底」肅清該校共黨及國家主義者，而 1930 年底蔣介石更公開指責中大「校風敗壞」，致使張乃燕下臺成爲定局。[24]

然而校園內擁有左派組織的生存空間並不代表共黨組織就能順利在此扎根，自 1928 年中共南京市委於第四中山大學（中央大學前身）設立支部以後，其黨組織便不斷遭到破壞，直至 1934 年 8 月中共南京市委遭徹底摧毀以前，中大校內黨員都不超過 5 名，亦未推動任何特別明顯的政治活動。[25] 因此，這樣的校園結構環境似乎就能解釋關露爲何更多是先從學術、文學角度接觸左翼思想，並且直到 1932 年才得以至上海加入共產黨。此外，基於 1930 年底過後的校內管理階層改組（更換校長）態勢，也能夠進一步理解參加「社會問題討論會」並積極從事校內學生運動（驅逐女宿指導員抗爭）的學生們，爲何會在 1931 年後一個個都遭到中大校方的強力懲處。[26]

參與過驅逐女宿指導員抗爭的關露，在 1931 年被中大以中學文憑問題爲由勒令退學後，便前往上海借住在曾資助過關露姐妹的劉道衡（1892-1986）、李劍華兩人的住所。同年，鍾潛九也被中大開除，他與張天翼、韓起一同前往上海，

---

24 蔣寶麟，〈中央大學的國民黨組織與國共鬥爭（1927-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3，頁 10-11。

25 蔣寶麟，〈中央大學的國民黨組織與國共鬥爭（1927-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3，頁 26。

26 丁言昭，《關露傳》，頁 14；蕭陽、廣群，《一個女作家的遭遇：記關露一生》，頁 72。

欲尋找「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下文簡稱左聯），[27] 並希冀能透過左聯取得更深入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機會。[28] 約莫在 1932 年，關露正式登記為共產黨員並且成功加入左聯，也於 1933 年 5 月接任左聯創作委員會主任職務。

下圖 1 為關露個人在 1928 年至 1936 左右所處的學院／政黨相關社團參與網絡，由此網絡圖像即可證實上述歷史環境的結構脈絡存在。我們可以注意到，據傳記資料庫所收錄曾就讀／服務於中大人士，其往後至 1936 年以前僅有關露及鍾潛九加入共產黨，其他中大師生幾無投入共產黨組織——雖然左傾思想在校園中傳遞，但在首都黨國體制的校園結構下，眞正決心加入共產黨工作仍只是少數人的選擇。換言之：中大是思想啓蒙之地，然而要接近正式政黨組織，必須得先離開中大及南京後才能有所突破。

左聯對關露而言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她以左翼文人身分大放異彩的時期，同時也是其正式從事共產黨系統工作之契機。關露從 1932 年入黨後不久便因張天翼的推薦而加入左聯。不同於純文藝組織，左聯實際上是共產黨旗下文學性運動團體，因此其中設有正式黨組織部門。此時左聯主要領導人物為丁玲（1904-1986）與胡風——丁玲身兼左聯的黨團書記及創作委員會負責人，胡風則是理論委員會負責人。關露進入左聯後便被分配至詩歌組，當時詩歌組正是由

27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潘漢年等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負責於 1930 年創立的左翼作家地下組織。左聯活動於 1930 年至 1935 年間，主要目標為與中國國民黨爭奪文化宣傳陣地。左聯當中最具影響力的作家為魯迅，而周揚則於其中擔任黨團書記，並在 1936 年因應全國抗日統一戰線創立，由其宣布解散左聯。

28 蕭陽、廣群，《一個女作家的遭遇：記關露一生》，頁 72-73。

丁玲轄管，也因此其與關露逐漸熟識，時常一同參與政治活動。[29] 而在丁玲於 1933 年 5 月被國民黨綁架之後，左聯黨團書記便由周揚（1907-1989）接任，且鑑於當時國民黨肅清日益加劇，使得周揚在白天幾乎無法行動，只能趁著晚間與其他成員聯繫，因此關露便開始替他擔任「交通」，[30] 這正是關露第一次從事地下工作的經驗。[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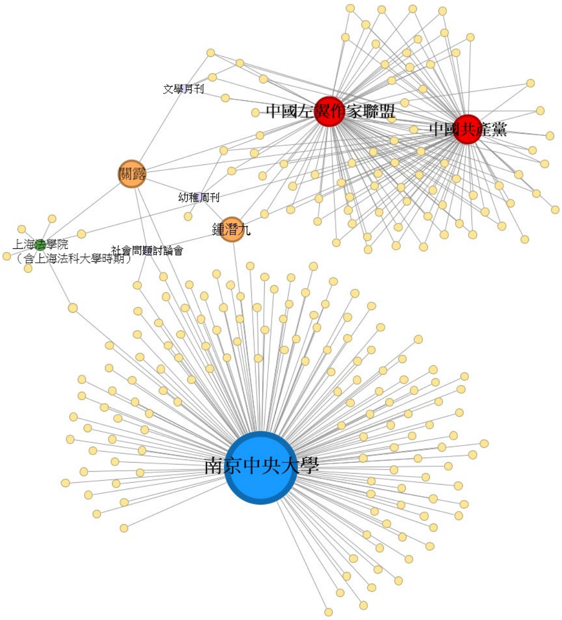

圖 1　1928 年至 1936 年關露所參與的學院／政黨相關社團網絡

29 周宗奇，《三個紅色殉道者：潘漢年、揚帆、關露的悲劇人生》（臺北：秀威資訊，2013），頁 82-84。

30 「交通」為一種情報工作類型，類似於擔任信差進行聯絡工作，並協助組織向對口傳遞情報資訊。

31 丁言昭，《關露傳》，頁 53。

關露在左聯時期，除了擔任周揚的交通之外，也同時撰寫了許多文學作品（無論是詩歌還是雜文等），其中雜文主題較多是圍繞在「婦女議題」。[32] 不管是何種類型作品，關露的創作路線自從進入左聯之後，便堅持標榜爲「大眾而書寫」。她曾在《新詩歌》裡刊載〈用什麼方法去寫詩〉一文以說明自身主張，反對將詩歌變成書寫個人風情的消遣品，認爲要從「過著鬥爭生活的大眾和向前發展著的社會動向中」尋找題材來書寫。[33] 這樣的創作路線其實直到上海淪陷期間亦是如此。但爲何在上海淪陷期間的她，卻不被周遭公眾社群承認爲「左翼文學作家」呢？

或許正是因爲關露和自己長期參與的左翼社會網絡迅速斷聯，並且由於地下工作的資訊隱密性，而使過去合作夥伴無法得知她投入其他團體的眞實任務，從而導致其後續個人形象也快速產生變化。

二、潛伏與邊緣化——關露抗日時期所投入的組織社會網絡及結構位置

1937 年國民黨軍隊撤出上海後，英法租界成爲「孤島」，當時上海人民對日本侵略極力抗爭，其中文學抵抗運動是最爲突出的，許多文人仍選擇留在英法租界進行抗日活動。而此時的關露也遵從地下黨（中共情報組織）指示留在租界從

[32] 周宗奇，《三個紅色殉道者：潘漢年、揚帆、關露的悲劇人生》，頁 88。

[33] 周宗奇，《三個紅色殉道者：潘漢年、揚帆、關露的悲劇人生》，頁 88。

事抗日相關工作，並積極參與以許廣平（1898-1968）爲首之左翼婦運人士所籌辦的《上海婦女》雜誌，投入刊物早期的編委會工作。[34] 直至 1939 年的深秋，其收到一封由南方局葉劍英（1897-1986）傳來的電報，要他盡速前往香港找化名小廖的廖承志（1908-1983，國民革命元老廖仲愷、何香凝夫婦之子）接受任務。抵達香港後，關露所見到的對口除了有廖承志外，還有已從左聯系統轉進地下工作多時的潘漢年（於往後擔任關露直屬長官）。這次指派給關露的工作事項便是她第一份「間諜」任務：接近汪精衛（1883-1944）政權「七十六號」特工總部，以進行策反情報主管李士群（1905-1943）的工作。[35] 當時地下黨爲何選擇關露對李士群進行策反，是基於其與李本人之間具有間接社交關係——關露妹夫李劍華曾在 1933 年因籌辦地下刊物遭到國民黨逮捕，所幸獲得李士群從中協助營救才得以脫身。據此，中共地下黨決定派遣關露擔任李士群與共產黨系統（主要對口爲潘漢年）之間的聯絡人。於是自 1939 年底以後，關露便迅速淡出了孤島時期其他左翼婦運人士的社會網絡。

下圖 2 爲根據婦女傳記資料庫所彙整的 1937 年至 1945 年以前《上海婦女》積極活動成員（如：發起人、編務工作

34 《上海婦女》雜誌由蔣逸霄任總編輯兼發行人，為中共地下黨組織在上海孤島時期與進步婦女聯合主辦的抗日救國刊物，具體編輯工作由姜平、許廣平負責，並且由蔡夏瑩、朱文央、關露、楊寶琛、季洪、黃碧瑤、樊英、王季愚、郭箴一、武桂芳等人組成編委會。另外羅瓊、黃定慧、郁風及陳露薇等人則一同參與該刊其餘編務工作。平平，〈【資料推介】抗戰時期的婦女雜誌（一）〉，自由微信，https://reurl.cc/V4deN6（2023 年 11 月檢索）。

35 周宗奇，《三個紅色殉道者：潘漢年、揚帆、關露的悲劇人生》，頁 123。

者等）各自串聯之社團參與網絡圖像。此網絡爲二模網絡，功能在於呈現這些行動者各自參與團體情形，我們首先彙整《上海婦女》早期核心成員的刊物參與及傳記資料庫網絡數據，當中有蔣逸霄（生卒年不詳）、姜平（1913-1968）、許廣平、蔡夏瑩（1910-1969）、朱文央（1899-1941）、關露、楊寶琛（生卒年不詳）、季洪（1913-1995）、黃碧瑤（1900-1988）、樊英（1904-1968）、王季愚（1908-1981）、郭箴一（生卒年不詳）、武桂芳（1915-1990）、羅瓊（1911-2006）、黃定慧（1907-2017）、郁風（1916-2007）及陳露薇（生卒年不詳）共計 17 人的團體參與資訊；另外依據其參與團體脈絡之重要性，也適度保留部分 1930 年代團體／期刊，例如：1932 年的「上海婦女抗日反帝大同盟」、1932 年至 1935 年的《女聲》半月刊以及 1936 年至 1938 年的《戰時婦女》旬刊。

不過由於現有資料庫當中上海日占時期的內容限制（我們的做法是彙整《上海婦女》成員各自參與的社交網絡，而非掌握上海「孤島」時期所有團體集結而成的整體性網絡），僅能判別《上海婦女》核心成員在此期間是否彼此共同參與多種期刊／團體以形成更緊密的社交網絡集群。總體觀之，關露在抗戰期間的社會活動實際上與其餘的刊物成員高度有別——除了《上海婦女》以外，她並未參與同屬左翼婦運刊物的《戰時婦女》，而自 1939 年過後也沒有參與太多其他較具規模的抗日團體，如：1941 年許廣平整合各界婦女抗日團體而組織的上海婦女界難民救助會，又或者是朱文央、蔣逸霄、董竹君等投入的上海婦女運動促進會。或者從更大活動脈絡來看，關露的抗日運動路線仍然是先從左翼文宣刊

物的撰稿、編務開始，而在上海全面淪陷時期（1941-1945）來臨前即投入地下黨系統任務，也不像一些較外圍成員如季洪或羅瓊等人，轉進至後方從事其他政治系統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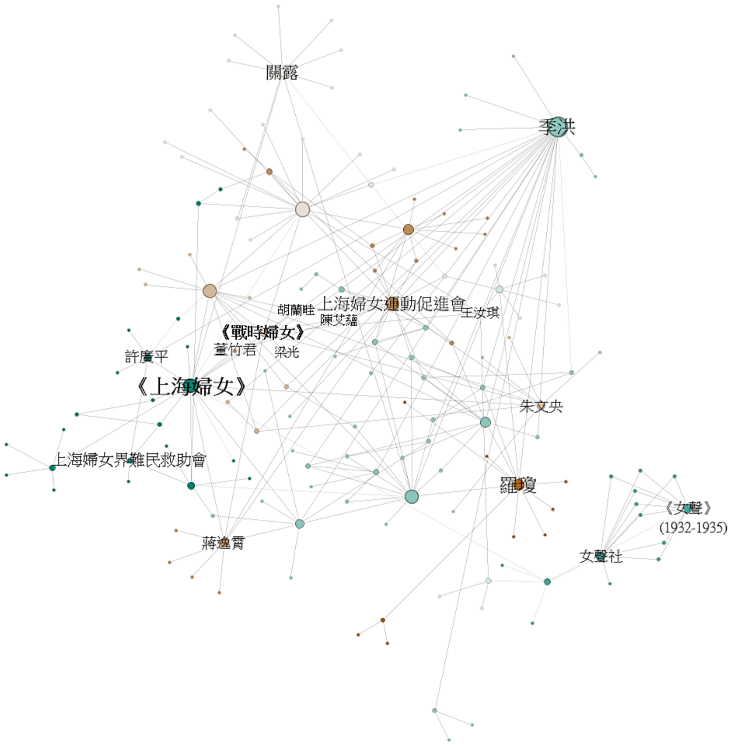

圖 2　1937 年至 1945 年以前《上海婦女》發起成員各自的社團參與網絡

而當我們使用模組連線轉換技術，進一步彙整出刊物／團體參與者重疊規模之網絡圖像，可以更明確呈現關露與上海婦女團體之間的隔閡情形，例如：圖 3 所示——基於圖 2

的行動者刊物／團體參與網絡（二模網絡）數據資料，將其中行動者節點移除，並轉置成爲刊物／團體互動網絡，即能建立起刊物／團體參與者重疊規模網絡（一模網絡），以判別密集群聚且連線邊界明確（連線權重爲重疊人數，因此連線越粗反映代表成員重疊性越高）的次級社群網絡。圖 3 的圈選處即爲關露所參加團體的次級社群網絡：可見她參與的團體多是在上海婦運成員的社會活動脈絡之外，尤其是 1942 年以後關露所積極投入經營的上海《女聲》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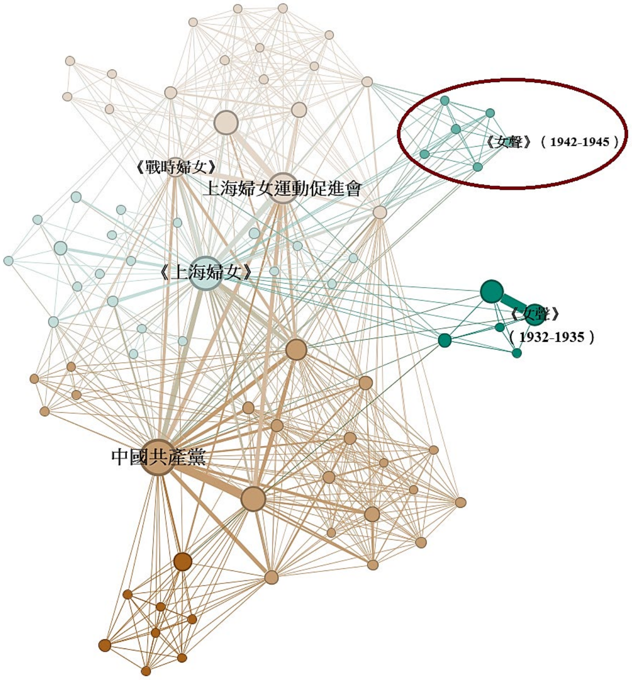

圖 3　根據圖 2 繪製之刊物／團體參與者重疊規模網絡（1937 年至 1945 年）

1942 年春天，甫完成策反李士群工作的關露再次接受地下黨派遣，經由日本共產主義活動家中西功（1910-1973）介紹下擔任日占上海時期官方扶植之婦女雜誌《女聲》的編輯，目標為嘗試打進日本總編輯的社會關係當中，以藉此結識、接洽日本左翼人士。[36] 《女聲》是一本由駐華日本使館以及汪政府出資的刊物，其紙張供應來源係由太平洋印刷公司提供，該公司為駐華日本海軍報道部所管轄，而雜誌的總編輯佐藤俊子（又名田村俊子，中文筆名「左俊芝」，1884-1944），是日本名聲顯赫的左翼女作家，深受社會主義影響且結識許多左派人士。[37] 此外，關露取得雜誌編輯的角色位置後，也為共產黨成員潛入此一刊物創造契機：以關露和以丁景唐（1920-2017）為主的地下黨員們逐步占領了《女聲》投稿版面，作為宣揚進步思想的陣地。[38] 但總體來說，正由於《女聲》係由日本官方出資且總編輯為日本籍人士，僅有底下編輯團隊成員為中國人，因此長期被社會輿論視為「漢奸」雜誌。[39]

日占上海時期《女聲》的創刊與發行，其最初目的為日

---

36 丁言昭，《關露傳》，頁 93-111；蕭陽、廣群，《一個女作家的遭遇：記關露一生》，頁 153、157。

37 楊佳嫻指出，因為《女聲》是日本駐中華民國（指汪政府）大使館和日本駐華海軍報道部合辦，官方色彩頗濃厚，後來在主編田村俊子（即佐藤俊子）堅持下，編務上相對獨立，但整體發行仍歸海軍報道部背景的太平書局。楊佳嫻，〈懸崖上的花園：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1942-1945）〉（臺北：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博士論文，2010），頁 144-145。

38 涂曉華，〈上海淪陷時期《女聲》雜誌的歷史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期 3，頁 85-104。

39 梅娘，〈兩個女人和一份婦女雜誌〉，《新文學史料》，期 1，頁 177。

本軍國主義者冀望透過文化宣傳爲其戰爭行爲建構合法性，然而非預期結果是佐藤俊子及中國作家關露等人在共同的左翼立場及「新女性」思想理念下，更加著重在爲關注中國婦女生活、傳播先進文化（如：自由戀愛、經濟獨立或科學知識等）提供平台，[40] 使其不致完全成爲官方訊息傳聲筒。例如：佐藤俊子並未積極替日本政府宣傳「大東亞共榮圈」，反而盡量淡化刊物的殖民色彩，三年間從未刊登親日政界要人的相關文章，且與之相對的是多元、豐富的社會性採訪主題——採訪地點橫跨各種場域：舉凡劇場、畫展、攝影棚、唱片公司，甚或是兒童教養院、菜市場、妓女出沒地及法庭等，而文章主要討論範疇都在婦女議題，且內容多具知識、趣味性，也集中呈現社會問題。[41]

雖然刊物出版背景、成員脈絡完全不同，但 1942 年後《女聲》雜誌的總體主旨基本上沿襲了戰前（1932-1935）由王伊蔚（1905-1993）等人任總編輯的《女聲》雜誌脈絡，除了公開討論婦女生活上的各式議題，同時注重於充實分享文學、電影、戲劇等文化訊息。

當關露進入《女聲》後，其著作文章多與婦女生活相關，舉凡戀愛、婚姻、家庭關係等問題，雖然受限於《女聲》雜誌主題以及間諜身分，必須盡可能消弭政治立場書寫，但其仍然能將左翼思想若有似無地揉合至文章中，字裡行間透露著女性自強、兩性平權以及反對封建思想的主張。[42]

40 涂曉華，〈上海淪陷時期《女聲》雜誌的歷史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期 3，頁 86-92。

41 涂曉華，〈《女聲》，上海淪陷時期的女權主義雜誌〉，獨立媒體新聞網，https://reurl.cc/zD1vDN（2023 年 11 月檢索）。

42 涂曉華，〈上海淪陷時期《女聲》雜誌的歷史考察〉，《中國現代文

1943 年，關露經由佐藤俊子與日本駐南京大使介紹下，赴日參加「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此一經歷成爲她生命中重要的轉捩點——這場活動正是關露被釘上「漢奸」的重要證據之一。當時中方參加的人員除了關露以外，還有魯風（本名劉祖澄，生卒年不詳）、張我軍（1902-1955）等人，而關露更肩負與日共地下黨員接觸的任務。關露在大會中以「自身做文學，因此在會中不談政治」爲由，發表「中日婦女文化交流」一談，聚焦在兩邊的婦女文化。關露理解這一次帶有濃厚政治意味的出行，很有可能令其與漢奸劃上等號，因此透過〈東京囈語：神經病態的日子〉一文反諷，希望藉此文爲自己所處困境解套。[43] 然而，這些預先自保作爲並不能夠讓關露逃離漢奸的指控與追緝。至少在國民黨政府方面的漢奸定義，即是「身爲中國人，投靠日本侵略者，甘心充當其走狗，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叛徒。」[44] 既然關露在日本人（佐藤俊子）底下工作，且所屬編輯部更是由日本軍方和大使館出資的，很難不被牽連，更甚是參加了大東亞文學者代表大會，其活動根本目標就是要推廣「大東亞共榮圈」精神。因此，在 1945 年對日抗戰結束後，關露終究受到當時社會輿論指責爲「文化漢奸」。

1945 年 11 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即出版《文化漢奸罪惡史》一書，將關露列爲「佐藤俊子的跟包」，批判她與日本領事館來往、與佐藤俊子共同編輯《女聲》，並在佐藤俊子逝世

學研究叢刊》，期 3，頁 93。

43 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頁 95-101。

44 丁言昭，《關露傳》，頁 125。

後爲其舉辦追悼會等事，[45] 意在提醒大眾關露在上海期間的公開身分。由於這些輿論定調，導致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關露同張愛玲一般都是背棄國家的漢奸，而即使共產黨內部高層並未忘記她的任務與身分——例如：周恩來（1898-1976）、王炳南（1908-1988）、李劍華、鍾潛九、夏衍（1900-1995）等人都協助關露逃離國民黨追捕，使得其並未陷入牢獄。[46] 其他外圍共產黨同志對她的不了解，也致使戰後部分報章雜誌版面上仍時有對關露身分持疑的批評文章出現：

> 勝利後，關露自稱為新四軍之地下工作者，但新四軍方面文人甚多，均不承認關露有地下任務，蓋新四軍方面文人最痛恨托派漢奸，關露此舉，實不甚高明。[47]

回到我們在社會網絡圖像的發現，正因爲 1940 年代與上海淪陷區既有文藝團體、婦運網絡的高度斷聯，我們可以注意到其網絡結構位置疏離所導致的結果，就是過往緊密友人不僅無法爲其聲援，更可能成爲輿論上更加嚴厲的抨擊者。例如：曾與關露交好的左翼婦運人士許廣平，在戰後並未有爲其辯護的論述；[48] 而在 1946 年周間小報上也曾刊載

---

45 司馬文偵，〈無恥文雌關露——佐藤俊子的跟包〉，《文化漢奸罪惡史》（上海：曙光出版社，1945），頁 41-42。

46 周宗奇，《三個紅色殉道者：潘漢年、揚帆、關露的悲劇人生》，頁 286-287；丁言昭，《關露傳》，頁 126-127。

47 陳榮臻，〈關露不是蘇北人物〉，《快活林》（上海），期 14（1946），頁 3。

48 據周海嬰個人回憶，關露約莫在 1939 年間曾邀請許廣平至其居所會面，在此以前她們彼此志趣相投，然而自從坊間聽說關與汪精衛方面有所接觸後，關與許便逐漸疏遠。而就周海嬰觀察，該次會面似有告別意涵，「歡愉的交談裡含有一絲悽楚，我是不能明白的。」此後得知零星消息指關露「投身日寇」以後，母親（即許廣平）便不再提及與接觸她了。周海嬰，〈一張關露的相片〉，收入丁言昭編，《關露

與關露同為左聯成員、交情匪淺，並於戰前號稱「文壇第一流人物」的知名女作家白薇（1894-1987），在返回上海後逢人便大罵關露通敵行為彷彿偷漢一般「失節」且不要臉。[49]

即便在戰後仍然能順利撤回到中共蘇區，也有消息指出中共已證實其為肩負任務之地下工作者，但一系列謠言中傷已令關露公眾形象嚴重受損，關於其戰後行蹤的新聞篇幅通常都聚焦在呈現她「複雜」、「開放」的兩性互動關係。

> 勝利後不久關露奉延安宣傳部的命令，到蘇北去參加新四軍陳毅的部下任政工人員……但她畢竟是一個都市女性，在淮陰工作了不多幾時，就跟一個姓郭的新四軍參謀發生戀情，後來又跟一個新四軍政治部任宣傳科長的青年双宿双飛，儼若夫婦……[50]
>
> 聞上海光復的前后，關露好像熱鍋上的螞蟻……幸虧她是個女人，搖身可以一變，跟隨了一些文化逆暗中逃奔蘇北。逃進了所謂「解放區」，她在上上下下什麼都解放了之後，更獲得了軍中一個「官職」，與「陳軍長」大談解放之道，談得親熱不堪！[51]

最終，伴隨著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渾沌不明的政治局勢，過往這段敵後工作經歷終將使關露無法迴避一系列以「漢奸審判」為名的共產黨派系鬥爭——1955 年，關

啊關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頁 194-196。

49 馬鄉，〈兩個女作家之間隔著一道鴻溝白薇大罵關露失節〉，《一周間》（不詳），期 11（1946），頁 11。

50 蘇泊，〈女作家關露潛伏延安〉，《國際新聞畫報》（上海），期 58（1946），頁 4。

51 李四，〈化名捧敵的落水女作家 關露逃奔蘇北濫談解放〉，《羅賓漢》（上海），1946 年 9 月 5 日，第 2 版。

露受到潘漢年案影響而被捕，當時的審查報告寫著：「關露在接受組織任務到敵偽機關期間，並未積極為黨工作而是公開地為敵人工作，起了漢奸的作用。」[52]

三、站錯隊？——以社會網絡考察關露在戰後共黨鬥爭中的風險處境

中國共產黨在建國初期，經歷多次的政治鬥爭，這些政治鬥爭往往是從單一個人牽扯到其所參與的社會網絡，進而牽扯到一個群體、甚至是和遭批鬥群體僅有間接互動的人，而鬥爭類型也並非只侷限於行政系統內部，也有文藝思想路線相關的政治審查案件。正因如此，關露案的特色便在於其遭遇的一系列調查與鬥爭並非只有涉及潘漢年案時期的「漢奸」指控，也由於其最初選擇的政治文藝路線，使得關露最終無論身在何種社會互動結構皆被迫陷入極端被動處境。

在本節內容中，我們將以關露與另一名與其在抗戰前左聯時期密切共事，並於 1955-1956 年同時陷入文藝路線鬥爭的左翼女作家——丁玲的社團參與網絡圖像進行整合分析，並搭配史料考證關露遭遇各種文藝調查案的緣起，試圖探究一度位處共產黨系統邊緣的關露爲何仍舊遭到鬥爭牽連。

自從左聯過後，這兩位在 1930 年代早期曾是緊密合作戰友的左翼女性文學家，走上截然不同的政治參與道路——丁玲在逃離國民黨軟禁後即輾轉前往陝北蘇區從事共黨文

52 柯興，《魂歸京都：關露傳》（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頁 307。

藝工作；[53] 關露則在地下黨指揮下繼續潛伏於上海。所以在進入接下來的分析之前，我們首先要闡明為何針對關露與丁玲進行比較分析，其可比性何在。

事實上，當年丁玲與關露在團體當中的幹部角色其實具有高度承繼關係——作為關的前輩，丁既曾擔任左聯黨團書記，又是創作委員會的負責人；而在丁遭到國民黨軟禁後，關隨後便接任了創作委員會主任一職。另一方面，在 1955 年中期的潘漢年案以外，關露被牽連的一系列批鬥案——1955 年的胡風案、丁陳反黨集團案以及 1966 年文革時期的周揚案——皆是與丁玲高度相關的案子。

因此考察這兩位行動者的文藝思想發展、社會活動脈絡，探究她們之間為何在各項批鬥案有不盡相同的命運，又或者是否還有更深刻的社會角色共通特質，我們便可能從中發掘這些文藝路線鬥爭的行動邏輯，以進一步推論最初在共產黨文藝系統的活動參與歷程，是否早已為關露往後的困境留下伏筆，而在這其中是否又有其他傳統社會結構因素影響，導致其可能會面對其他污名論述的抨擊。

時間回到 1955 年，若不計入戰後轉移至蘇區時遭遇的新四軍整風運動，這一年是關露被牽扯進中共建國後各種政治鬥爭的最初起點。該年與她相關的審查案件共有兩件：胡風案與潘漢年案，且後者使關露遭受更大打擊，因此繫獄數年。

牽扯關露的第一起案——1955 年 1 月的胡風案——肇因於兩位左翼文化代表人物，胡風與周揚之間的文藝思想路線

---

[53] 宗誠，《風雨人生・丁玲傳》（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頁 162-170。

對抗，且早在左聯時期便已因兩派文人的權力鬥爭而白熱化。1936 年周揚於左聯解散、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提倡相應的「國防文學」路線。在當時救亡的觀念下所開展的國防文學論爭中，周揚主張文藝工作者不該成爲左翼宗派主義者，如此只會把革命文學從廣泛人民大眾視野拉開，並認爲文藝界未來只有兩派：不是國防文藝，便是漢奸文藝。[54] 此時親近於魯迅（1881-1936）、茅盾（1896-1981）集團的胡風，則因不滿周揚欲率先占據運動領導權的企圖，便發表近似主張的〈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一文，另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以與周揚的「國防文學」口號相抗衡：[55]

> 新的憤怒新的抗戰，凡這一切形成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歷史階段當然向文學提出反映它底特質的要求，供給了新的美學的基礎，因而能夠描寫這個文學本身底性質的應該是一個新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56]

到了 1954 年，一篇批評紅學家俞平伯（1900-1990）在《紅樓夢》研究中潛藏唯心主義觀點的〈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他〉一文遭到《文藝報》退稿，此事件使得毛澤東（1893-1976）方面掌握對知識分子推動思想批判運動的契

---

54 周揚，〈關於國防文學——略評徐行先生的國防文學反對論〉，原載於《文學界》，卷 1 號 1（1936 年 6 月 5 日），收錄於新潮出版社編，《國防文學論戰》（上海：新潮出版社，1936），頁 121-130。

55 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裡——丁玲傳》（臺北：業強出版社，1998），頁 303-304。

56 胡風，〈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收入登太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上海：長江書店，1936），頁 1-2。

機。[57]《文藝報》是由中國作家協會（以下簡稱作協）主辦的刊物，當時是由馮雪峰（1903-1976）擔任主編，前任主編則係丁玲。由於丁玲此時已退出《文藝報》編輯團隊，所以在事件發展初期沒有特別遭受牽連。但並非《文藝報》主編，也非屬作協領導人物的胡風，在得知毛澤東針對此一事件發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論述時，卻誤以為此次批判行動是針對當前掌握作協領導權的周揚陣營，因而藉機於聯席會議上大肆批評他們，結果卻導致周揚派系發起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鬥爭，[58] 並在毛澤東授意下提升至「反革命集團」的肅反清查、逮捕行動層次。[59]

值得一提的是，正因為胡風案及相近時間（1953）發生的「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案」，使得毛澤東決定嚴格檢視共產黨內部人員是否「忠誠」，並在當年的非例行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嚴厲要求與會人員自我審查或公開自我批評，這才導致潘漢年在上繳自我審查報告時，坦承自己確實曾與汪精衛會面。而此舉既造成毛澤東認為「此人從此不可信用」，也為後續一系列針對具有「漢奸」嫌疑之地下黨工作者的政治審查揭開序幕。[60] 曾在潘指揮之下擔任汪政權「七十六號」特工總部主管聯絡人的關露，因此無法倖免。

另外，由胡風案所延伸出的「丁陳反黨集團案」，也使得關露在 1957 年自潘漢年案服刑出獄後仍無法馬上恢復共

57 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裡——丁玲傳》，頁 307。
58 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裡——丁玲傳》，頁 308。
59 劉志剛，〈胡風事件的再思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7 月），頁 90-95。
60 周宗奇，《三個紅色殉道者：潘漢年、揚帆、關露的悲劇人生》，頁 339。

產黨黨籍——僅因 1939 年曾發表過一篇介紹當事人丁玲寫作生平的文章，便造成關露無法向當局交代清楚自己與（被打爲「大右派」、「反黨分子」的）丁玲之間的社交關係。[61]

（一）整體網絡位置及文藝路線的異同

關露爲何會被胡風案牽連？其實關露與胡風除了在中大時期結識以及往後在左聯共同工作之外，長期以來關係較不緊密，且因爲關露間諜身分的關係，與既有文藝圈早已脫節，然而早年的這層社交關係，終究使其遭受胡風案牽連。從關露的各式傳記中都可以看到胡風案被提起，如：丁言昭的《關露傳》就特別寫道：

> 1955 年 5 月 13 日至 6 月 10 日，《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三批《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並加了編者按語，全國各地戰線展開了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群眾運動。1955 年 6 月 15 日，關露在北京被捕。[62]

而在另一本關露傳記《一個女作家的遭遇》當中，即明確記載她被隔離審查的原因：「由於她在南京中央大學上學時以及在『左聯』工作時期和胡風有過接觸，在所謂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運動中曾經被隔離審查。」[63]

圖 4 爲根據關露與丁玲在 1955 年以前政治活動歷程所彙整而成的各自參與社團活動網絡圖像（二模網絡），其中淺綠色節點爲團體，灰色節點則是行動者。暗紅色圈選處首

---

61 柯興，《魂歸京都：關露傳》，頁 307。該文為關露，〈女作家印象記——女戰士丁玲——〉，《上海婦女》，卷 2 期 8（1939 年 2 月），頁 27-28。

62 丁言昭，《關露傳》，頁 140。

63 蕭陽、廣群，《一個女作家的遭遇：記關露一生》，頁 100。

先是丁玲與關露共同參與的團體，可明確看出左聯（紅色節點）正是關、丁及胡風、周揚曾共享的重要集體活動脈絡。然而從節點布局來看，關露爲偏下方粉紅色節點，丁玲爲偏上方橘色節點，而藍色節點處及褐色節點處則分別爲胡風與周揚，由此可以注意到的是關露最終與前述三位行動者在社會網絡中距離並未如此緊密，顯示除了左聯以外，她與其他三人並未享有更多的共同團體參與脈絡；且若將社團活動網絡轉置爲行動者社會關係網絡（一模網絡），如圖 5 所示，放在跨時性較長的整體網絡下進行比較分析，運用模組性（modularity）[64] 衡量指標判讀行動者之間社群關係緊密程度並區分爲不同色層群集後，也可發現關露與其他人並不屬於同一群集（關爲綠色，其他三人爲灰色）。實際上在胡風案與其後續延伸的丁、陳集團反黨集團案審查中，關露最終都能僥倖脫身、未被定罪。

然而除了社會網絡位置的判別以外，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文藝圈政治審查所採用的重要判罪指標之一，就是能夠一定程度反映意識形態立場的文章論述內容。

64 模組性（modularity）指標的功能在於協助執行網絡社群偵測（Network Community Detection），以判別整體網絡下的次級社群分布狀態。模組性越高代表該社群中節點連結密度高，同時與其他社群有較低的連結密度。而經由模組化分類並為行動者／團體節點加以上色後，即可有效區別不同類別的社群分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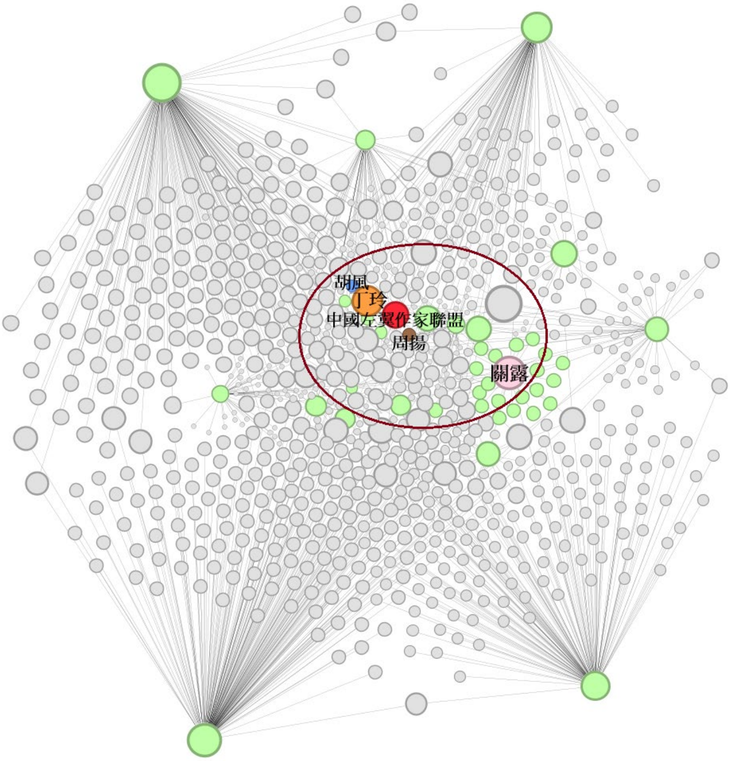

圖 4　丁玲及關露各自參與社團活動網絡（1955 年以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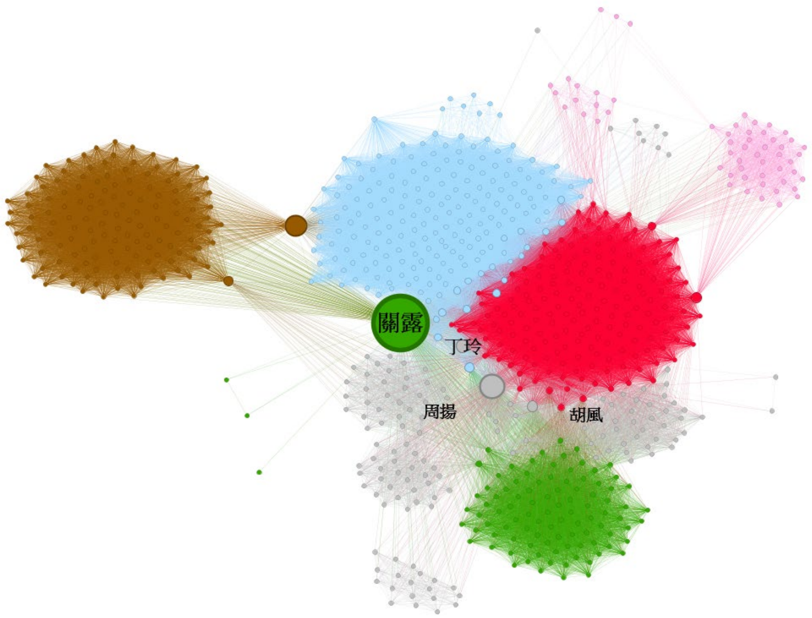

圖 5　以圖 4 網絡為基礎轉置之行動者社會關係網絡

1950 年代建國初期的中共，爲了確立政權社會基礎，具體作爲是藉由「政治分層」工作來組織「階級隊伍」，以便將國家內部的社會階層重新定位，並區分爲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及民族資產階級；至於其餘的反革命分子、地主與國民黨殘餘勢力，便總體歸納爲新社會的敵人。如此

作爲有助於更加明確的敵我區分，而執政當局往後也爲「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身分轉化的政治鬥爭策略打下論述基礎。[65]

此時的知識分子群體，在新的社會階序當中實爲一組關係曖昧的「中間階層」：雖然中央必須取得他們對新社會與革命的支持及服務，卻得留意其內心是否可能存有資產階級思想。因此，對於知識分子「立場、觀點、方法」問題之批判及改正工作顯得格外重要，[66] 且在定調是否要批鬥／定罪的前置作業中，掌握思想論述「實證材料」的重要性也不言而喻。

據此，經過史料爬梳後，本文認爲或許是因爲關露過往的國防文學論述立場，才有機會令其在以文藝路線、風格作爲判準的政治審查當中，意外發揮避險效果。

依據現有文獻資料，或有可能使關露間接避免最終定罪的論據，應是其於 1936 年 7 月 10 日在《大晚報》所撰寫的〈關於國防詩歌〉一文，表達自己對於當前國防文學口號之下該採取什麼樣的寫作方法及如何選材的看法。而此文主旨正是在響應周揚路線的基礎下，細緻探討方法論立場，並呼籲創作者在此路線不必過分執著特定文學主義掛帥：

> 關於寫作上的問題，蘇聯的詩人也談過，記得蘇聯有

---

65 高華，《身分和差異：1949-1965 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人民日報》編輯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收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冊 9，頁 560-594；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卷 5，頁 363-402。

66 高華，《身分和差異：1949-1965 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頁 16-20。

> 一位詩人批評烏克蘭的詩人說：「他們以為寫詩要用吶喊起頭，才能表現詩的熱烈情緒……還有些人，他們一開始便想著自己要作一個什麼主義者……其實這都是不必要的。主要的是要把自己的生活，參加到時時都在鬥爭著的現實生活當中；現實的生活是偉大的，由偉大的堆積著的人類的事業，決定我們的作品形式，形式問題不是首先廢人思考的。」[67]

但同樣涉入此案的丁玲便沒有那麼幸運——由於在 1933 年 5 月曾被國民黨擄走且軟禁三年，經胡風、馮雪峰、張天翼等於其親近的共產黨員積極營救下才終於得以逃離南京，丁玲的「忠誠問題」一直受到許多共產黨員的懷疑。此外，丁玲在 1942 年延安整風運動時，也因批評父權社會問題而遭受點名批判，[68] 雖然最終未被懲處，其個人未婚且曾與多名男性交往、生子的經歷及伴隨而來的非傳統女性形象，仍導致部分黨內同志對其多所議論。[69] 如此個人形象，在建國後中共確立更加嚴厲的「肅反運動」指導方針下，繼續參與政治運動有一定程度的風險。

---

67 關露，〈關於國防詩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編，《「兩個口號」論爭資料選編（上）——中國文學史資料全編・現代卷》（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頁 378-379。

68 丁玲，〈三八節有感〉，《海上文學百家文庫・丁玲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頁 429。

69 丁玲加入共產黨以前曾與共產黨員胡也頻結婚並誕生一子，而在胡也頻遭國民黨處決後，其與馮達同居時也與馮共同生下一個孩子；且坊間報章亦時常關注其情感經歷，據此可得知丁玲在當時應屬感情思想較前衛的人，從而導致周遭對其時有耳語。愚公，〈作家印象：丁玲的輪廓畫：他的轉變和其他〉，《新人周刊》（不詳），卷 2，期 26（1936 年 2 月），頁 519；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裡——丁玲傳》，頁 277。

因此，若將丁玲遭受胡風案牽連的脈絡稍稍往前追溯，早在 1949 年作協初辦《文藝報》時，就曾經有人刻意撰文將先後擔任主編的丁玲和陳企霞貼上「丁、陳集團」的標籤。[70] 而在 1955 年丁玲因胡風案而被迫撰寫批判胡風的文章不久後，作協當中的黨組副書記劉白羽（1916-2005）和黨總支書記阮章競（1914-2002）竟採納了康濯（1920-1991）的揭發材料，共同署名向中央宣傳部「正式」揭發丁玲、陳企霞等人的「思想問題」。[71] 至此，丁玲和陳企霞便由於胡風案的廣泛牽連而成爲了「反黨集團」的一份子，且最終造成丁在 1957 年被劃歸爲右派並剝奪黨籍。[72]

當我們重回胡風案主角的社會關係脈絡，即可發現作爲主要被批鬥對象的胡風和馮雪峰，正係 1936 年營救丁玲的共產黨同志。另外，根據網絡圖像（圖 4）中呈現距離較爲靠近的布局，其實也反映丁玲和周揚、胡風皆共同參與兩個以上的文藝、政治團體，他們的互動關係相較關露與周、胡之間來得更緊密，從而顯示此次鬥爭可能具有的部分宗派主義性質——對胡風發起攻擊的作協實際領導人爲周揚（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其相關調查小組則有可能是依據胡、馮兩人之社交關係去標定周圍審查對象，其中丁玲又是這層社交關係裡重要的行動者之一，甚至也有可能正是中央指示的另一波重要整肅對象；[73] 而「丁、陳反黨集團」案也是在

70 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裡——丁玲傳》，頁 306。

71 楊佳欣，《丁玲與周揚的恩怨》（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頁 69；徐慶全，《革命吞噬它的兒女——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記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頁 168-169。

72 宗誠，《風雨人生・丁玲傳》，頁 246-250。

73 在整體性政治脈絡之下，丁、陳案其實在中央宣傳部於 1954 年調查

作協會議上所共同討論、建構出來的。[74]

然而，爲了取得後續行動正當性，發起鬥爭的一方必然要以「實證」來（加強）定調對手的思想路線立場：

> 許多同志提到了《莎菲女士的日記》。要瞭解丁玲的性格和思想，讀一讀她 30 年前的這篇成名之作，倒是很有幫助的。書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可怕的虛無主義的個人主義者……如果說這篇小說表現的是她早年的思想，那麼她入黨很久以後，特別是在革命根據地生活了幾年以後，卻寫了像〈我在霞村的時候〉和〈在醫院中〉這樣的作品，就說明她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後來不但沒有改好，反而發展到和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尖銳對立的地步。〈我在霞村的時候〉這篇小說，把一個被日本侵略者搶去作隨營娼妓的女子，當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值得注意的是，馮雪峰在〈丁玲文集後記〉中，卻說作者所描寫的這個「靈魂」，是如何如何的「豐富和有光芒的偉大」。這就看出，他們的口味是如何相投了。丁玲在 1941 年寫的〈在醫院中〉，更是集中地表現了她對工人階級、對勞動人民的敵視……小說把革命根據地的勞動群眾寫成愚蠢的、麻木的人……丁玲這篇小說，正是宣傳了她反黨、反人民的「真理」，狂熱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

《文藝報》早期粗暴批評作家爭議時，就已被提升至「反黨、反中央」的批判層次；再者由於「肅反運動」規模擴大，過去個人「歷史問題」的重新追溯，終將造成丁玲無法阻止自己遭到更進一步懲戒的命運。徐慶全，《革命吞噬它的兒女——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記實》，頁 122-158。

74 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裡——丁玲傳》，頁 308。

> 「真理」……多少年來，莎菲女士的靈魂始終附在丁玲的身上，只是後來她穿上了共產主義者的衣裳，因而她的面貌就不那麼容易為人們所識別，而她作起壞事來危害也就更大了……她和陳企霞、馮雪峰把他們當時主編的《文藝報》變成了獨立王國。1954 年黨和文藝界檢查《文藝報》工作中的錯誤，這就大大地觸怒了他們。他們的「王國」是誰也碰不得的……反革命的胡風也把他們當作可以爭取合作的「實力派」。[75]

總結關露和丁玲各自在胡風案的遭遇，我們能夠初步理解胡風批鬥案相關人士審查的定罪成立要件，除了是要判別行動者之間社會關係的親疏性，也要基於這些社會關係找尋到批鬥標的，進一步蒐集或「製作」那些足夠定調其思想路線立場的實證材料，確立其身分符合「敵我矛盾」的批判標準。

（二）因人設事的「站錯隊」判準

不過黨對關露及丁玲的考驗卻尚未結束，在 1967 年文化大革命時期，她們再次遭逢牽連入獄的命運，且諷刺的是本次鬥爭緣由，竟再度與左聯有所牽扯——在胡風案時期據主導地位的周揚，雖於 1955 年的政治對抗中達成毛澤東指示的一系列批鬥任務，然而在 1960 年代爲抵制江青對文藝

---

[75] 此文為 1958 年 2 月 28 日《人民日報》刊登，周揚主筆（且經毛澤東批改）之針對丁玲等人進行總結清算的評論文章〈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本文節錄內容，引自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頁 414-417。

界干涉，遂與領導層峰爆發衝突。1966 年 7 月 1 日，中共中央委員會所發行的官方刊物《紅旗》半月刊重新發表了毛澤東的演講文稿《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公開點名批判周揚。至此周揚便被打爲資產階級文藝黑線的代表人物。[76]

根據《中國共產黨口述史料叢書》第三卷資料中，可見部分文章記錄了當時的文革情境——街上時不時就有寫著「打倒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的字眼。而《人民日報》更以大篇幅刊登姚文元（1931-2005）撰述之〈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一文，痛批周揚是「對毛澤東思想刻骨仇恨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77]

除此之外，姚文元更在文中直接點名了有哪些人是與周揚所處同一集團的「黑線」文藝人士：

> 一條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文藝路線，是黑線。它的總頭目，就是周揚。周揚背后是最近被粉碎的那個陰謀篡黨、篡軍、篡政的反革命集團。胡風、馮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陽、林默涵、田漢、夏衍、陽翰笙、齊燕銘、陳荒煤、邵荃麟等等，都是這個黑線之內的人物。[78]

從關露的回憶文章來看，也可以發現其在文革期間遭到逮捕和批鬥的緣由之一，便是她在 1930 年代參與了周揚及其他左翼文人所共同組織的「左聯」：

---

76 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紅旗》（北京），期 1（1967），頁 14-36。

77 張復，〈我眼中的周揚〉，高永中主編，《中國共產黨口述史料叢書》（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卷 3，頁 388。

78 姚文元，〈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紅旗》，期 1，頁 35。

> 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在秦城監獄住了八年。「四人幫」抓我，不只是因為我與「左聯」的關係，還有其他原因。但是，這八年中的提審，有一半以上是叫我交代關於「左聯」情況的。他們迫使我交代關於「左聯」的每一個人，以及他們所幹的「壞事」。其中最多的是關於周揚同志，說他提出「國防文學」口號是攻擊魯迅的。[79]

此時，有可能令關露得以躲過 1955 年胡風案罪名、於周揚及黨中央對胡風的政治鬥爭中得以存活的證據，卻可能導致共產黨當局將她與周揚劃歸爲同一群體成員。1966 年以後，曾經拯救關露的〈關於國防詩歌〉一文，如今卻有極大機會成爲令關露淪爲階下囚的罪證之一。因爲這一系列審查正是以清算過去響應「國防文學」路線者爲其中一個重要目標：

> 有一天晚上，他們提審我……並問我對周揚同志提「國防文學」口號，有意攻擊魯迅一事，我當時站在什麼立場時，我說，周揚沒有攻擊魯迅……我認為「國防」是保衛祖國。「國防文學」就是愛國文學，因此，我擁護「國防文學」這個口號。有一個審訊人員聽了這番回答，勃然大怒，揪起我的頭髮，當胸打了我幾拳。[80]

無論是丁玲或關露，她們的社會網絡關係及文藝思想路線定調，都在周揚案當中得到充分的確立——若關露的回憶

79 關露，〈我想起了左聯〉，收入編輯組編，《左聯回憶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上冊，頁 239。

80 關露，〈我想起了左聯〉，收入《左聯回憶錄》，上冊，頁 239。

屬實，則這些政治審查所針對的社會互動時間軸高度聚焦在 1930 年代，丁、關兩人顯然無一倖免。而這兩個曾在左聯時期與周揚共事的運動夥伴，一位早在 1957 年便被打爲崇尚個人主義的「右派」陣營，另一位則因早年響應「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總頭目」提倡的「國防文學」口號，而成爲了 1966 年文革時期官方陣營判定之「盲從」的「黑線黨徒」。

另一方面，左翼新女性的形象身分也往往使得這些女性作家不管能否獲得清白，都得長期承受反動論述將其與「政治污點」和「蕩婦羞辱」意象連結所帶來的負面形象——例如：關露於 1945 年成功撤退至中共蘇區後仍常被輿論諷刺其「失節」，並穿鑿附會地探尋其情感生活；丁玲在 1942 年延安整風運動中，雖在最後並未被懲處，然而其較爲豐富的親密關係經歷，卻持續遭受多數人議論與批評。換言之，所謂的「站錯隊」將不單是指參與團體、思想路線的選擇性「偏差」，更包含了性別規範的「踰矩」。

又或者從更廣泛的視野來看，丁、關兩者最大的共通點，便在於相較男性政治受難者，當外在行爲表現逾越了黨組織設立的「絕對忠誠」界線時，其所處社會結構角色（即女性身分）不但未能幫助她們減輕相應疑慮，更爲此增添了許多不確定性。

結論

本文嘗試在社會網絡分析技術協助之下，更加立體呈現關露投身左翼政治活動的一系列生命史（life history）脈絡，與此同時也希望透過網絡圖像與既有史料的交互辯證，探尋

在漢奸審判案以外，是否仍有更多社會活動線索，使得關露終究難以迴避中共政治鬥爭的命運。這樣分析取徑的目標，在於拓寬既有關露研究課題的討論面向——跳脫過去多聚焦於傳記書寫或文本分析的研究主旋律，增加其個人與周邊社會網絡關係的考察視野。一旦釐清行動者生命史當中更大的社會活動脈絡，便得以掌握關露的顛躓人生背後，所可能涉及的各種整體性結構成因。

在第一階段分析中，我們首先考證關露如何接觸左翼思想與投身相關志業的行動歷程。在釐清 1928-1930 年南京中央大學校園內部政治結構以後，便可以判斷具有左派立場的「社會問題討論會」如何能夠在國民政府官辦大學當中獲得生存空間。但開放的校園環境不代表共黨系統就能在此順利扎根，如此脈絡足以間接解釋包含關露在內的「社會問題討論會」同仁在遭到中大退學後，勢單力薄的他們爲何必須先離開南京並前往上海，才能進一步開展他們的左翼政治活動志業。

但在甫經歷國民黨清黨、政治環境風聲鶴唳的 1930 年代初期，組織中心位於上海、社團本質仍舊是中共地下組織的左聯，其成員於日常活動中時常面臨人身安全風險。1933 年 5 月左聯的黨團書記丁玲遭到國民黨綁架，此後便由周揚接任其職務。基於對白色恐怖情勢益加升溫的擔憂，周揚必須有一位在白天爲其傳送訊息至相關組織的聯絡人，此時關露便接下這份「交通」任務，開啓她更進一步投身「地下黨工作」的機緣。

第二階段的生命史歷程分析，我們則著重於考察關露在對日抗戰時期（1937-1945）所投入的組織網絡及角色位置。

在 1939 年接下間諜任務以前，經由地下黨指示而留在上海租界的關露，其實積極投入在婦女抗日運動團體及相關刊物工作之中。然而隨著關露正式成為地下黨情報工作者以後，她便迅速和上海既有婦女運動網絡斷聯。而與既有文藝團體、婦運網絡高度隔離的結果，就是在經歷日占時期臥底執行《女聲》雜誌編務工作後，過往密切互動的抗日婦女運動夥伴，不僅無法在 1945 年戰後的文化漢奸指控議題上為其聲援，更可能成為輿論上更加嚴厲的抨擊者。而即便日後有部分消息證實其「清白」，公眾輿論仍試圖在「婦女形象」議題上對關露大作文章。

時間來到戰後，關露無可避免地因為曾經的間諜身分而捲入潘漢年案的相關審查，不過在此之前的胡風案以及 1966 年文革時期的周揚批鬥案，其實也反映了作為一位政治鬥爭受害者，關露的社會身分是更具高度複雜性的——戰後針對關露的一系列調查與鬥爭，也包含 1930 年代參與左聯之經歷以及（文藝）思想立場表態，致使她無論身處何種社會互動網絡中，皆被迫陷入極端被動的受審困境。

因此在第三階段的歷史考察中，我們即以關露和另一名左翼女作家——丁玲的社團參與網絡進行整合分析，試圖理解一度位處共黨文藝系統邊緣的關露為何仍舊遭到鬥爭牽連。探究關露、丁玲兩人之間的可比性，除了是因為後者在左聯時期的幹部身分和前者有高度承繼關係，也在於兩者所涉入的批鬥案具備高度重疊性。因此將她們並置進行比較之目的，便係檢視這兩位女性受難者為何在各個批鬥案當中有不盡相同的命運，又或者是否具備更深刻的社會角色共通特質。

首先，如果是從跨時性較長的整體社會網絡下進行分析，便能注意到除了左聯經歷以外，關露與其他關鍵涉案人士的社會互動關係並未如此緊密，且她在 1936 年所響應的文藝思想路線並不同於胡風，或有可能間接保障其不會在胡風相關的兩項批鬥案中被定罪；然而丁玲則因為其所處社會網絡位置和周、胡兩人過於緊密（共同參加兩個以上團體），再加上與胡風匪淺的社交關係，導致其終究不能從宗派主義鬥爭中脫身。

至於 1966 年文革時期的周揚案對於關露和丁玲而言，則不論是社會互動關係及思想路線定調，皆在審查當中獲得確立——除了這波政治調查所針對的其中一個活動時間軸聚焦於左聯團體成員緊密合作的 1930 年代，兩位行動者也具備思想路線的「偏差」：丁玲屬於崇尚個人主義文學的右派陣營，關露則是響應「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總頭目」所提倡之「國防文學」路線的「黑線黨徒」。

最終，社會網絡的同質性、思想路線的「偏差」，再加上性別規範的「踰矩」，致使如關露、丁玲這樣的左翼女性作家，似乎終究難逃遭受國家及社會指責的命運。

總結上述，綜覽關露的生命歷程，我們注意到其為何會走向顛躓人生的可能原因，除了是一系列文藝、政治鬥爭牽連的偶然結果，若從關露 1930 年代投入上海左翼政治活動脈絡、1940 年代與既有抗日婦運團體疏遠的社會網絡關係，以及在文學口號論戰中的文藝路線立場來看，其個人如何逐漸步入更高風險處境，似乎也係有跡可循。此外，關露批鬥案所具有的代表性，在於其突顯近現代中國社會文化環境底下，女性菁英政治受難者的社會角色共通特徵——女性受難

者所遭遇到的公眾挑戰，不僅會是政治立場、思想路線的批判，這些指控也常與性別歧視論述合流，爲她們創造了更具不確定性的忠誠疑慮，以及難以抹滅的個人形象污名。

徵引書目

一、報刊

《一周間》（不詳），1946。
《女聲》（上海），1943、1944。
《快活林》（上海），1946。
《紅旗》（北京），1967。
《國際新聞畫報》（上海），1946。
《新人周刊》（不詳），1936。
《羅賓漢》（上海），1946。

二、專書

（一）中文

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裡——丁玲傳》。臺北：業強出版社，1998。
丁言昭編，《關露啊關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丁言昭，《關露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丁玲著，徐俊西編，《海上文學百家文庫．丁玲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選集》，卷5。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冊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司馬文偵，《文化漢奸罪惡史》。上海：曙光出版社，1945。

衣若蘭，《從列女傳到婦女史：近代中國女性史書寫的蜿蜒之路》。臺北：時報文化，2023。

周宗奇，《三個紅色殉道者：潘漢年、揚帆、關露的悲劇人生》。臺北：秀威資訊，2013。

宗誠，《風雨人生．丁玲傳》。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

柯興，《魂歸京都：關露傳》。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

徐慶全，《革命吞噬它的兒女——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記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

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高永中主編，《中國共產黨口述史料叢書》，卷 3。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

高華，《身分和差異：1949-1965 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004。

新潮出版社編，《國防文學論戰》。上海：新潮出版社，1936。

楊佳欣，《丁玲與周揚的恩怨》。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蕭陽、廣群，《一個女作家的遭遇：記關露一生》。黑龍江：北方文藝出版社，1988。

羅久蓉，《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二）西文

Caine, Barbara, *Biography and History.*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9.

三、論文

王占璽，〈社會網絡分析與中國研究：關係網絡的測量與分析〉，《中國大陸研究》，卷 58 期 2，2015 年 6 月，頁 23-59。

金觀濤、劉青峰，〈反右運動與延安整風〉，《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 40，1997 年 4 月，頁 21-34。
胡風，〈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收入登太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上海：長江書店，1936，頁 1-5。
涂曉華，〈上海淪陷時期《女聲》雜誌的歷史考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期 3，2005 年 6 月，頁 85-104。
高王凌、劉洋，〈土改的極端化〉，《二十一世紀雙月刊》，期 111，2009 年 2 月，頁 36-47。
張皓，〈殊異的共同體：臺灣南、北客家菁英的社會網絡（1987-1999）〉，《全球客家研究》，期 17，2021 年 11 月，頁 1-48。
梅娘，〈兩個女人和一份婦女雜誌〉，《新文學史料》，期 1，2001 年 2 月，頁 175-179。
連玲玲，〈戰爭陰影下的婦女文化：孤島上海的婦女期刊初探〉，《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0，2012 年 12 月，頁 69-106。
楊佳嫻，〈懸崖上的花園：太平洋戰爭時期上海文學場域（1942-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博士論文，2010 年 7 月。
葉韋君，〈後五四時期的知識婦女：《婦女共鳴》的社會網絡（1929-1944）〉，《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3，2019 年 6 月，頁 113-162。
劉志剛，〈胡風事件的再思考〉。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年 7 月。
蔣寶麟，〈中央大學的國民黨組織與國共鬥爭（1927-1949）〉，《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73，2011 年 9 月，頁 1-52。
闕慧蓉，〈1940 年代上海地區之女性文學活動——以關露、蘇青、

潘柳黛、施濟美、俞昭明爲探討中心〉。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5 年 7 月。

關露，〈女作家印象記——女戰士丁玲——〉，《上海婦女》，卷 2 期 8，1939 年 2 月，頁 27-28。

關露，〈我想起了左聯〉，收入編輯組編，《左聯回憶錄》，上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頁 239。

關露，〈關於國防詩歌〉，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編，《「兩個口號」論爭資料選編（上）——中國文學史資料全編・現代卷》。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頁 377-379。

羅久蓉，〈抗戰勝利後中共懲審漢奸初探〉，《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23（下），1994 年 6 月，頁 269-291。

四、網路資源

Hanneman, Robert A. and Riddle, Mark, *Introduction to Social Network Methods*. Riverside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2005. https://faculty.ucr.edu/~hanneman/nettext/（2023 年 11 月檢索）。

平平，〈【資料推介】抗戰時期的婦女雜誌（一）〉，自由微信，https://reurl.cc/V4deN6（2023 年 11 月檢索）。

全國報刊索引，https://www.cnbksy.com/v2/（2024 年 7 月 30 日檢索）。

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係文獻數據平台，https://www.modernhistory.org.cn/#/（2023 年 11 月檢索）。

近代婦女期刊資料庫，https://mhdb.mh.sinica.edu.tw/magazine/web/（2023 年 11 月檢索）。

近代婦女傳記資料庫，https://mhdb.mh.sinica.edu.tw/women_bio/（2023 年 11 月檢索）。

涂曉華，〈《女聲》，上海淪陷時期的女權主義雜誌〉，獨立媒體新聞網，https://reurl.cc/zD1vDN（2023 年 11 月檢索）。

Her Destiny? The Tragic Life of Guan Lu (1907-1982)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pproach

Chang Hao*, Chiang Pin-Hsuan**, Lee Jou-Yi***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dvanced the large-scale prosecution of traitors, namely hanjian 漢奸, with the case of Guan Lu 關露（1907–1982） being a complex and representative example. However, due to limitations in methodologies, previous related research has largely struggled to grasp the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general landscape of the historical actor.

Employing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he present article examines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of Guan Lu to explore how certain structural factors such as the effects of social links affected the direction of her life course. The nodes of analysis, including members of political parties, writing circles, and social movements, mainly come from the "Modern Women' Journals Database" and the "Research Platform for Modern Women's

*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Biographies" esta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t Academia Sinica. In addition to examining the social-network landscape of Guan Lu, this article takes Ding Ling 丁玲 （1904-1986）, a female writer who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Guan Lu, as an example for the purposes of comparativeanalysis, namely considering the possible group divisions such as ideological criticism and public opinion on gender that the two may have faced.

The article finds that Guan Lu experienced an acute disconnection with her social network, namely that of the women's movement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in Shanghai, after 1939, which may have put her in a more passive position when facing accusations of being a traitor. Additionally, the case of Zhou Yang 周揚（1907-1989）in the perio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has been largely overlooked in previous research, was one of the key reasons for the more severe criticism that Guan Lu received.

Keywords: Cultural Revolution, gender, social network, traitor, *hanjian*, Guan Lu